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1年8月1日 (第242期)
仅供参考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美专家称拜登的对华政策是混乱的

拜登没有在接触和对抗之间选择一边，而是在理论上进行折中。然而，在现实中这样的策略很容易陷入无可救药的矛盾之中。

中美关系

美专家建议用“数字马歇尔计划”对抗“数字丝绸之路”

美国《国会山》(The Hill)网站近日登载“美国领导力倡议”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奥里特·弗伦克尔(Orit Frenkel)等的文章称,美国国会和政府似乎均同意,在关键技术方面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尽管政府和国会已经正确地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但这些并不够。拜登和其他盟国领导人在“七国集团”(G7)峰会上提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以及特朗普政府期间成立的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均不足以完成任务。

文章称,为了提供一个现实的替代中国的方案,美国应启动一项“数字马歇尔计划”,以发展电信、互联网和尖端技术。G7领导人应团结协作,并与世界银行一道,为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创造一个强有力的、资金充足的挑战。

美国国会也必须发挥自身的作用。如果这些法案成为立法,国会将需要批准资金并抵制淡化一切的冲动。众议院必须通过其版本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USICA),最可行的方法是将众议院科学委员会的一些法案与众议院版的《无尽前沿法案》结合起来。该法案还应该增加条款以解决关键的竞争力担忧,如中国对稀土元素近乎垄断的地位。一旦这项工作完成,国会必须投入足够的资源,努力确保美国及其盟友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基于开放、透明和问责的“民主价值观”的“数字马歇尔计划”。

CSIS 专家提出四条与中国竞争的路线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副总裁马修·古德曼

(Matthew P. Goodman)近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美欧如何在印太地区合作以应对中国作证。他在证词中提出了四条与中国竞争的路线：

古德曼认为，要应对中国挑战，遏制中国或与中国广泛脱钩都不现实。首先，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都与中国存在一定的相互依存关系。其次，中国在气候变化、疫情和防止核扩散等跨国挑战中处于核心地位，如果美国及其合作伙伴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避免要与中国政府接触。

为了在给这种接触留有空间的同时，确保能够应对中国的竞争，古德曼认为可以采取四条路线，包括两条防御性路线和两条进攻性路线。

在防御性路线方面，首先，美国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来保护关键技术和供应链。近年来，美国加强了投资审查和出口管制，对保护关键技术和供应链发挥了广泛作用，确保关键供应链和国际研究合作的适应性和完整性的工作也取得了成效。实施这些政策的关键是要坚持开放——无论是贸易、投资还是科学合作，只有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实施限制。

其次，捍卫现行规范与准则。如果中国违反了现有的贸易规则，美国应当在世贸组织的体系下或根据国内法律对其提出质疑；如果中国进行大规模“补贴”或其他活动，则需要制定新规则和政策加以限制；如果中国的借贷助长了不可持续的债务，则应当推动提高透明度。

在进攻性路线方面，首先，要跑在中国前面。要加大对自身竞争力基础的投资，包括教育和劳动力技能、研发和可持续基础设施。对此，国会两院正在进行各项立法。美国还需要在国际标准制定和倡导美国优先的数据治理系统方面加强努力。

其次，提出一个积极的愿景，以及实现愿景的可靠政策和方

案。即便中国没有“挑战”当今国际秩序，维护和更新高标准规范和准则，促进安全繁荣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在机遇最好、争议最大的印太地区，盟国和合作伙伴要求美国在这一地区展现长期承诺的呼声也最强烈。美国要么需要重新加入像《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那样的贸易协定，要么提供一个可靠的经济战略来取代它。

美专家称拜登的对华政策是混乱的

拜登没有在接触和对抗之间选择一边，而是在理论上进行折中。然而，在现实中这样的策略很容易陷入无可救药的矛盾之中。

美国《国会山》网站 7 月 21 日登载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AFPC）印太研究项目研究员迈克尔·苏波利克（Michael Sobolik）的文章称，美国总统拜登的对华政策是他自己制造的一个悖论。文章摘译如下：

一方面，拜登坚持美国将在必要时与中共竞争，并用鲜明的术语描述这种竞争：民主与“威权主义”之争；另一方面，拜登将气候变化认定为“人类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一问题也需要中国做出全球反应。

从各方面来看，这种方法比拜登的前任们尝试的任何方法都要困难。拜登没有在接触和对抗之间选择一边，而是在理论上进行折中。然而，在现实中，这样的策略很容易陷入无可救药的矛盾之中。譬如，拜登近期以存在“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新疆数家光伏企业，但却未对另外几家存在“同样行为”的公司实施制裁。此举在拜登的国安团队和气候变化团队之间引发了跨部门之争，后者认为，完全禁止进口新疆地区的太阳能组件可能会

威胁到拜登政府最重要的政策优先事项。

即便如此，有人猜测，拜登的行为或许表明，他越来越愿意在必要时单独对抗中共，就像特朗普政府在 2019 年和 2020 年所做的那样。然而，拜登政府的高级政府官员立即对这种可能性泼了冷水：“我们的重点是确保我们从过去四年来定义美国政策的单边行动转向真正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合作。”这番话释放出来的信息很明确：如果制裁外国实体威胁到气候议程或激怒关键盟友，拜登政府可能会三思而后行。

所有这些都凸显出拜登现在面临的问题：当他的票仓希望他做完全相反的事情时，如何面对中共所谓的“侵犯人权行为”？拜登最近的言论表明，他可能会尝试通过象征性的制裁来做办不到的事。然而，这样做有可能忽视中共的弱点。通过一些创造性的制裁，华盛顿可以切断中共“一带一路”倡议一半的贸易路线。但进步人士似乎满足于以与北京达成另一项气候协议的名义，保留这一杠杆。

整个事件很好地说明了拜登的对华政策为何有可能陷入困境。虽然气候变化等跨国问题需要外交和多边回应，但大国竞争主要取决于美国的实力和一致性。通过对其他新疆“不法分子”手下留情，拜登政府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气候而非人权才是其首要任务。

华邮：美国应加大在台湾问题上“威慑”中国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 7 月 21 日载文称，由于中国加强了武力收复台湾的“威胁”，美国军队内部对此的警觉越来越高。文章就美国如何在台湾问题上加强对北京的“威慑”提出了建议。

文章称，大陆对台湾进行两栖攻击是最难实施的军事行动之

一，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可能没有能力这样做。但北京不一定非要“入侵”才能实现其目标。北京有实际的能力来封锁台湾地区。台湾可以尝试打破束缚，但如果台湾开火，大陆军队可能会以网络袭击、导弹袭击和空袭作为回应，“摧毁”台湾的电网和蜂窝网络，关闭其机场，并进一步“损害”其经济。

这不仅是台北的噩梦，也是华盛顿的噩梦。1979 年的《台湾关系法》表示，美国将关注“任何以和平方式以外的方式，包括通过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未来的努力”。但它并没有保证美国会保卫台湾。美国会愿意冒险与另一个核大国开战吗？还是任由台湾倒下？屈服将对美国在亚洲战略地位造成重大打击，但这可能比一场美国很容易输掉的战争更可取。如果美国想避免这种可能性，它就需要更加努力地“威慑”中国。

首先，美国需要消除它是否保卫台湾的模糊性。美国意图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战争的风险。拜登应该声明，虽然美国不会支持台湾宣布“独立”，但如果它遭受攻击，美国将保卫台湾。日本也需要更加明确其保卫台湾的承诺。

其次，美国需要建立更可信的威慑力量。五角大楼最近的作战演习显示，美国正输给中国，后者储备了旨在击败美国常规部队的“非对称”能力，如导弹、潜艇、网络武器和空间武器。由于中国的“航母杀手”导弹和潜艇带来的危险，美国航空母舰不能再在靠近中国的任何地方运行。

美国空军去年的一场作战演习表明，美国使用大型和小型飞机，以及能从运输机上投下的自动化弹药会做得更好。部署大量导弹发射器、无人机和传感器使美国不必依赖容易受到大陆攻击的水面舰艇、短程战斗机或地区基地。台湾本身也需要在这些高科技能力上投入更多。

当前的问题是，国防部继续建设和部署那些很可能会导致美

国输掉与中国的战争的常规军事力量。美国应停止购买更多的航空母舰、驱逐舰和短程战斗机，并开始购买更多无人系统。除非美国采取更多措施来改造其军队，否则它将无法有效地阻止大陆对台湾的攻击。

美国外交

北约如何在应对中国挑战中发挥作用

美国《外交家》(Diplomat)杂志近日登载《北约不应过多干涉中国问题》的文章称，在今年6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美国及其盟国领导人开始为适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做准备。但北约必须清楚自己在适应来自东方的新挑战者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

文章称，一方面，中国的崛起加上来自俄罗斯的持续威胁，使得北约作为“自由社会”保护者的地位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北约不能在这个方向上偏离太多，需要确保它并未偏离保证其成员国安全和防御的核心任务。北约必须通过关注三个领域来实现这种平衡。

首先，随着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它必须抵制“走向全球”的新诱惑，这是因为它不适合，也无法同意在欧洲-大西洋以外地区投射力量。北约还应该探索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现有伙伴关系的意义，专注于具有军事意义的高科技，这是中国在全球崛起的一个方面，北约在这方面拥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其次，北约应澄清“弹性”的含义，尽可能将“弹性”与集体防御和国家安全联系起来。中国对北约来说不是领土威胁，但其在欧洲获得的交通枢纽以及未来压制天基导航系统(如GPS)的能力削弱了北约军队在危机情况下的机动性。再次，北约应该考虑如何加强内部凝聚

力。北约应把分担军事负担作为增强联盟凝聚力的方案。中国的崛起凸显出，欧洲人必须为保卫自己的大陆贡献更多的力量，以便美国把军事资源集中在亚洲。

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不应只关注中国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网站 7 月 20 日登载大西洋理事会“网络治国”项目研究员贾斯汀·舍曼 (Justin Sherman) 等的文章称，在此前举行的美欧峰会上，美欧双方同意成立一个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TTC)。但若美国和欧洲要有效地推动民主技术，就必须防止该委员会陷入一个明显而迫在眉睫的陷阱：完全针对中国。

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明显是为了反抗中国政府在技术领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但是，如果欧盟和美国在寻求技术合作时过分关注中国，可能会复制困扰美国“互联网自由”议程的问题。由于在很大程度上聚焦西方价值观，该议程经常被认为脱离了当前的地缘政治现实。这限制了“自由民主”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在许多关键互联网“摇摆国家”的吸引力。将该技术委员会的作用局限于回应北京的“威胁”也可能限制其活动和雄心的范围。对中国政策反应过度只会冒险模仿中国的行为，且会破坏各方自愿采用的、由多个利益相关方推动的长达数十年的互联网标准制定过程。

从长远来看，美国和欧盟可以制定并非局限于针对中国的、更具吸引力、更积极的互联网治理愿景。该委员会可以专注于促进真正、务实和包容的治理结构，开发有吸引力的、积极的互联网治理模式。

美学者称拜登应与各种政权打交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近日登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亚伦·米勒（Aaron David Miller）等的文章称，将世界划分为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也许有助于发表振奋人心的演讲，但却妨碍了以正确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文章摘要如下：

拜登表示，他愿意与竞争对手进行对话，不希望再次发生冷战。但是有时候他的言论听起来好像他正在为一场新冷战做准备，正在构想一种强调他“民主国家联盟”愿景的“拜登主义”。然而，现实是，世界上许多棘手的问题——从气候变化到中东的冲突——都需要与专制、甚至独裁政权合作。

一项有效的外交政策意味着，接受美国不得不与非民主国家合作。一种不必要地将世界划分为好人和坏人的外交政策原则有可能疏远那些必须与俄罗斯等国打交道的民主国家，使解决全球挑战变得更加困难，并不必要地凸显美国外交政策的不一致。

拜登已经与最强大的“威权”国家领导人接触，并寻求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希望建立一个竞争性共存的框架，在该框架内，各国可以管理分歧并减少冲突风险。在俄罗斯方面，最紧迫的问题是争取普京的合作，以遏制网络攻击。就中国而言，主要问题是确保中国做出更强有力的承诺，加快向碳中和经济转型，更好地配合美国和欧洲应对气候变化的新计划。

拜登之所以努力在独裁者和民主人士之间划清界限，是因为他坚持认为“美国回来了”，成为了全球领导的领头羊。把俄罗斯和其他独裁政权国家塑造成全球“恶棍”也是聪明的国内政治，但拜登的“我们和他们”的言论并不是实施外交政策或安抚盟友最有效的方式。

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有一种长期存在的倾向，就是用民主理想的外衣来掩盖对美国利益的追求：既让它在国内更受欢迎，

也让它在国外有更好的形象。在拜登提出美国外交政策必须反映美国价值观的观点时，他应该明确地表明，我们面临着一个复杂、混乱的世界，追求美国利益和安全需要经常与各种政权打交道。

兰德公司学者为美国的大洋洲战略支招

美国 War on the Rocks 网站 7 月 19 日登载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家珍妮弗·莫罗尼 (Jennifer D. P. Moroney) 等的文章，就美国如何制定一项针对大洋洲的长期战略提出了四项建议。文章摘要如下：

尽管拜登政府对大洋洲的兴趣不断增加，但美国政府并没有一项针对太平洋岛国的全面战略。中国已认真地与大洋洲接触，填补战略空白，而美国几十年来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大洋洲，现在正努力在那里站稳脚跟。

为了构建一项与太平洋岛国接触的长期战略，文章提出以下四项建议：第一，国防部的安全合作规划者和实施者应该向在这些国家有更多经验的盟友寻求指导。他们可以利用美国盟友在该地区的经验和存在，特别是在所罗门群岛、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斐济群岛。

第二，美国官员应确保他们听取太平洋岛国官员的意见，并注意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所有国家对援助的需求或愿望完全相同。在该地区有效地开展工作需要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进行规划。美国陆军在 2020 年新成立的“大洋洲工作组”是一支包含现役军队、预备役部队、国民警卫队士兵的混合力量，也是帮助与该地区国家建立长期关系的一个良好开端。

第三，规划者应从一开始就将太平洋岛国官员纳入安全合作规划进程中，而不是告诉他们已经做出的决定。

第四，可以采取多部门、全政府的方法，而不是军事对军事的方法。美国的盟友们建议扩大多国工作组（该工作组包括“五眼联盟”、法国和日本）的关注点，将某些关注卫生安全、机构能力构建、韧性、人道援助的机构纳入进来。美国国防部应该从消除冲突和与大洋洲盟友协调行动的方式，转向一种联合规划和实施的方式。这种方法将让美国及其盟友在太平洋岛国获得影响力，更好地与中国竞争。

美国政治/其他

民调显示美绝大多数选民担心生活成本上升

美国《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网站7月21日援引一项新民调结果称，90%的选民担忧生活成本上升，拜登应该为这一点感到担忧。

文章称，根据保守宣传组织美国行动网络(American Action Network)进行的一项新民调，绝大多数选民表示，他们对美国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感到担忧。调查显示，88%的受访者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或多或少”或“非常”担忧，86%的人担心通胀，79%的人担心油价上涨，73%的人担心即将到来的增税。

美国劳工部最近公布，美国上个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price index)比去年同期上涨了5.4%。如果不考虑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类别，价格同比上涨4.5%，为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生产者价格指数(producer-price index)是一项单独的通胀指标，用于监测企业的商品和服务价格，6月份同比上涨7.3%，高于5月份的6.6%。

该民调结果出炉之际，美国总统拜登正因通胀加剧而受到密

切关注。美国共和党议员和共和党竞选委员会大多利用商品和服务价格飙升来抨击拜登的经济议程。

白宫宣布成立工作组来应对勒索软件威胁

美国《政客》(Politico)网站7月14日载文称,在一系列高调的黑客攻击暴露出网络安全漏洞的风险之后,白宫已经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工作组来协调一系列抵御和打击勒索软件的措施。

文章称,白宫正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不断增长的勒索软件威胁,包括悬赏1000万美元获取黑客身份信息、对黑客团伙发动网络攻击,与企业合作推动勒索软件传染的信息共享等,并已经成立了一个勒索软件工作组。

据一名匿名参议院助手透露,在勒索软件工作组的监督下,联邦机构正展开一系列行动,如促进关键基础设施企业的数字韧性,阻止通过加密货币平台支付赎金,与美国盟友协调行动等。该工作组会“每周跟踪全国反勒索软件工作的进展”,并定期向白宫通报各部门的最新工作。

文章称,美国国务院将提供总计1000万美元悬赏网络罪犯的信息,特别是国家批准的入侵关键基础设施的黑客。美国政府将探索与网络保险提供商和关键基础设施企业建立合作,帮助企业 and 政府更迅速地共享有关勒索软件攻击的信息。此外,一个由两党参议员组成的小组预计将在近期提出立法,要求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向政府报告黑客攻击。

美出口管制政策痼疾再次抬头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国际商务高级顾问威廉·莱因施 (William Alan Reinsch) 的文章称, 出口管制在美国国家安全中具有重要作用, 但不可能替代一项健全的、促进美国工业繁荣发展的技术政策。文章摘要如下:

随着白宫提名前国防部官员艾伦·埃斯特维兹 (Alan Estevez) 担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 负责领导工业和安全事务, 出口管制再次成为热门话题。艾伦极少在公开场合谈论中国, 这将有助于他顺利就职, 但不能避免大众质疑他对中国的看法, 共和党对华鹰派也将向他施压, 要求他采取强硬路线。

在确认提名的过程中, 那些意欲竞选总统和找话题的共和党参议员会指责拜登政府对华软弱。这个极具煽动性的话题可能会导致政策失误, 并在现实中危害国家安全。

有关管控半导体出口的讨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国是芯片公司最大的“威胁”, 也是最好的客户。尽管尖端产品的出口受限, 但较老、较低级别的芯片却不受限制, 为美国公司提供了研发新一代芯片的重要资金来源。

前几届政府通过坚持美国技术领先对手一到两代的总体政策、实施根据特定最终用户的诚意发放许可证的具体控制政策、说服他国采取相似道路的方法来应对这一问题。但面临着既有意愿又有资源实现技术自主的对手, 这种方式是否已失效? 从某些方面来说, 将半导体视为“基础性”技术, 实施更广泛的控制, 例如重新控制较旧的芯片, 只会恶化事态。这不仅是亡羊补牢, 还会让美国工业失去开发下一代芯片的收入, 危害国家安全。

和他的前任一样, 埃斯特韦兹面临的挑战是, 如何在管控不足和过度管控之间保持平衡, 而国会的猛烈抨击使这难上加难。

到目前为止, 拜登政府似乎采取了一条更为克制的道路, 即

保留上届政府开发的工具，如直接产品规则和对军事最终用途/最终用户的定义，使政府更有效地控制基于美国技术的外国生产，更积极地接触制造同类产品的盟国和合作伙伴，并说服他们采取同样措施。政府更加注重半导体制造技术，而非芯片本身，这有助于阻碍中国发展具有竞争力的能力。

此外，由于世界上有竞争力的芯片制造国不多，且往往和美国有着相同的担忧，因此与盟友合作会比简单地依赖美国的治外法权发挥更大作用。

学者分析美国防部的未来战略和力量选择

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网站 7 月 20 日登载该智库高级研究员兼国防项目主任斯塔西·佩蒂约翰（Stacie Pettyjohn）等执笔的报告，分析了拜登政府下一个《国防战略报告》（NDS）的可能走向，以及这些不同的方向对联合作战部队的结构和预算意味着什么。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拜登政府正在制定下一个国防战略。为了分析拜登政府的下一个国防战略，以及不同路径的利弊，报告发展出三种可能的战略：高端威慑（high-end deterrence）、日常竞争（day-to-day competition）和全方位竞争（full-spectrum competition）。

报告对 2022 财年预算的分析表明，国防部试图在未来几年内做的事情超出了有限的预算范围，并正朝着报告所谓的“全方位竞争”的战略发展。拜登政府似乎正在推行一项战略，寻求在近期竞争与加强为大国冲突做准备之间取得平衡，同时对冲一系列威胁，并在一段时间内减少风险。这种竞争所需的力量和态势，与抵御大陆对台湾或俄罗斯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常规既成事实“攻击”所需的力量和态势有很大不同。美国不太可能以目前的方针

建立一支能够实现这两个目标的部队。

报告对该战略下预算有限的部队的测试发现，它不能成功地实现其两个主要目标：击败次常规侵略以及俄罗斯和中国的“灰色地带”战术，并建立一支能够在大国对手攻击其邻国时击败它的部队。此外，这一战略有严重的过度扩张的风险，还存在长期技术被超越、引发意外升级的可能性。

其他两项战略聚焦中国，但日常竞争强调与中国的日常军事竞争和次常规冲突威胁，而高端威慑聚焦击败常规侵略和获得长期技术优势。日常竞争战略可能会使美国在东亚和欧洲输掉一场高端冲突，也无法阻止次常规领土掠夺。这一竞争战略认为，一支积极地与日常军事挑衅竞争的强大军队能够威慑常规和次常规侵略，即使军队无法阻止这两种攻击。这种假设失败的风险与日俱增，因为这种战略放弃对先进技术的投资，而中俄等国正快速寻求从美国手中“夺取”军事技术优势。

相比之下，报告认为，高端威慑是最好的前进道路，但是该战略需要对威胁、联合作战部队的责任和长期的战略纪律进行更好的划分和排序。国会也必须支持这一战略，并允许国防部做出艰难的选择，如削减能力和退役武器系统，这是重新平衡部队以完成这一任务，并在长期保持军事技术优势所必需的。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正在进行一些与高端威慑战略相一致的重大投资。尽管如此，2022 年《国防战略报告》和 2023 财年预算将需要接受更多的风险并进一步确定优先事项，以使部队为最具挑战性和最重大的威胁做好准备。如果拜登政府不做出这些艰难的选择，或者国会拒绝支持这一战略，那么美国的战略和军事目标与实现这些目标的成本之间的鸿沟只会越来越大。

美民主党是否变成了一个左翼政党？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近期发文称，美民主党目前的状况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该党的意识形态成分日趋左翼化。在比尔·克林顿第一个任期以来的 25 年里，温和派在该党的比例从 48% 下降到 35%，而自由派则由 25% 翻了一番达到 51%。另一方面，温和派为拜登的竞选胜利贡献了比自由派更多的选票，正如这几十年来历任赢得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一样。那么，民主党有可能变成一个左翼政党吗？文章摘要如下：

尽管自 1980 年吉米·卡特败选以来大体上呈现增幅的走势，自由主义者在选民中的比例仍少于保守派和温和派。虽然大多数自由派是民主党人，但许多温和派不是共和党人就是独立派人士。在 2020 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拜登在自由派和民主党人中的表现仅略好于 2016 年竞选的希拉里，但他在温和派和无党派人士中的表现要比希拉里好得多。民主党在温和派选票中所占的比例从 52% 提高到 64%，得票率则从 12% 提高到 30%。拜登还将民主党在无党派人士中的比例从 42% 提高到 54%，从而使民主党从 2016 年 4% 的劣势扭转为 2020 年 13% 的优势。

因此，在国家层面，民主党的胜利依赖于大批既非民主党也非自由派的选民。成功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必须赢得温和派选民的绝对多数，而不是狭隘多数，而且他们至少必须在无党派人士中保持这种优势。

民主党初选环节的选民们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现实。民主党最近一次出现最左翼的候选人是在 1972 年，而大选的结果使得他们放弃了这一走向。尽管该党在过去 25 年中逐步向左翼靠拢，但民主党人在选择总统候选人时不得不考虑现实情况。有人可能会认为，在具有巨大优势的地方，民主党的得票情况会大相径庭。但正如最近在纽约市举行的市长初选所表明的，情况未必如此。

尽管此前纽约市长一职先后由朱利安尼（连任一次）和布隆伯格（连任两次）担任，许多观察家仍坚持认为纽约可能是除旧金山以外美国最为自由主义化的大城市。

令他们惊讶的是，在最近的市长竞选中，获胜者和排名第二的候选人并非最左翼的候选人。获胜者埃里克·亚当斯以“法律与秩序”中间派和建制派政客的身份参选；排名第二的凯瑟琳·加西亚在市政厅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排名第三的玛雅·威利受到了左翼选民的拥护和左翼众议员科尔特斯（AOC）的支持。另一位温和派候选人安德鲁·杨在竞选活动的最后几周与加西亚结盟，位列第四。无论是第一轮投票结果，还是该市采用的排名选择投票（Ranked Choice Voting）过程的动态，都展现出了类似的总体情况。

相关调查结果十分有趣。亚当斯在布鲁克林、皇后区和布朗克斯区三个较不富裕的非裔美国人区获胜。这是因为他明确拒绝了有关“解散警察”的呼吁，而这一呼吁来自于“许多年轻的富有白人”推动的对话。大多数少数族裔社区都希望有更多更好的警察以维持治安，而亚当斯作为一名具有改革思想的前警官，在这一点上赢得了特别的信任。像拜登之前一样，亚当斯似乎也明白，活跃的左翼流行观点并不总适合那些最有可能受到犯罪率上升影响的选民。

事实证明，即使在纽约，民主党人也需要平衡大部分白人进步派和工薪阶层选民的观念，后者中许多人是少数族裔，他们关注自己社区的状况，并将具体结果置于意识形态之前。当民主党人展望 2022 年中期选举和 2024 年大选，而社会和文化问题将引起激烈争论之时，这一教训不应被忘记。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